

中亚与西北边疆研究丛书



遏制、整合与塑造： 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

曾向红 著





控制、整合与塑造：

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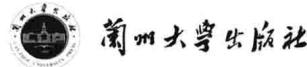
陈忠明 著



本书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批准号：06JZD0012）
与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遏制、整合与塑造： 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

曾向红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 / 曾向红著.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311-04584-5

I. ①遏… II. ①曾…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中亚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6442号

策划编辑 李晖

责任编辑 李晖 张雪宁

封面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

作 者 曾向红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军区空军印刷厂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610千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584-5

定 价 53.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序

中亚处于中国、俄罗斯、高加索、西亚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地理位置的重要，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发挥重要的地缘政治作用。在近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亚没有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很少有人想去了解它或真正认识它。麦金德曾在一个多世纪之前预言过中亚将成为世界陆权争夺的中心，但他没有想到十月革命的发生会完全改变中亚的地缘政治地位，这也使人们忘掉了麦金德的预言。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让世界重新看到了中亚，但这并不意味着麦金德的预言实现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独立，极大地改变了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而苏联解体留下的外部权力真空及中亚的能源、安全等因素，使大国积极介入这一地区，也使外部世界从新的视角了解和对待中亚成为可能和必需。同时，中亚各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也不可能避免地受到介入该地区事务的大国的影响。

大国对中亚事务的介入使国内出现了大量研究大国中亚战略、政策与具体行为的学术成果，其中，又以关注美国的最多。其原因主要是，第一，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中亚地区的兴趣以及为此所做的投入，构成影响中亚地区局势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使人们对它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和愿望。其次，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接触和互动越来越多。美国是否会在与中国毗邻的中亚地区遏制中国，是中国学界、政界和公众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再次，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享有传统优势不同，美国积极介入中亚事务是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后，这与当代中国发展与中亚国家间关系的历程相似。关注和研究美国的中亚政策，做一种并行的比较，无疑是有益的。最后，中亚地区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毗邻，双方在经济、安全、文化等层面上存在着诸多联系。中亚地区的形势发展，会直接影响到新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发展，而美国在

中亚地区的活动情况，无疑会对新疆的局势发展产生影响。总之，中亚与中国为邻，任何外部力量在中亚的存在都不会与中国无关。美国的中亚政策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这些影响会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发挥什么作用，是中美双方都关心的事。我想，双方研究对方中亚政策的学术成果会越来越多，这也是双方应该有更多交流的一个领域。

本书《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下称《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是中国学者关于美国中亚政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作者曾向红现任职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此前曾是我指导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是他耗时三年完成的，倾注了不少心血。与国内其他关于美国中亚政策的研究成果相比，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对美国介入中亚事务二十多年的过程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国内学术界关于美国中亚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少，但缺乏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而本书不仅回顾了美国中亚政策的演变过程、追求的战略目标及其指导思想，而且还对美国为追求其战略目标所使用的政策手段以及美国在各领域开展的具体活动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此外还对美国中亚政策的效果及其演变趋势做了展望。可以说，本书较好地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为人们了解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及所做的投入提供了新的、较为全面的参考。

第二，本书提供了一种研究美国中亚政策的分析框架。美国介入中亚事务的活动，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如果没有一种适当的框架予以分析，很容易陷入复杂和破碎的细节描述之中。本书在提出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遏制、整合与塑造三重战略目标的基础上，认为这三重战略目标分别得到了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美国学术界“文明冲突论”与“民主和平论”等理论的启发和影响，并主要通过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与呈现性权力这三种政策工具来予以实现。美国中亚政策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与政策手段之间大致的对应关系，构成本书的一种分析框架。这种框架虽然可能会引发争议，但比较新颖，它是本书第三、第四、第五章所做的案例研究的思想性支撑。

第三，《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文献资料丰富、学理性较好。本书对美国中亚政策的研究，除征引了美国领导人关于中亚问题的一些表述以及美国政府和国会的一些重要文件外，还大量参考了美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表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尤其是本书第五章整理的美国1996年至2011年间美国研究中亚问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目录，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中亚研究的整体状

况，而且为我们研究各方面的中亚问题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资料。此外，作者对美国主要的中亚问题研究机构和研究者的整理，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中亚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作者在前言中表示，希望《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一书实现三个方面的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结合、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研究与对美国的中亚政策研究的结合、研究美国对中亚的介入与研究中亚国家对此的回应的结合。我认为，本书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作者良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功底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使本书在理论分析、研究视角、资料积累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少新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一个大国的地区政策进行分析而达到相当理论深度的成果，目前并不多见。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国内美国中亚政策研究的深入。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可以改进之处，如主要使用了英文文献，几乎没有参考俄语研究成果；虽然分析了较多的案例，但是对美国介入中亚事务时所从事的其他一些重要活动的分析明显不足；没有把美国中亚政策实施的效果单独纳入一章进行集中论述，“总结”部分的篇幅过短，等等。作为作者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出现一些不足是难免的，这不会影响他应该得到的鼓励。

本书从理论的角度对美国的中亚政策这一重要的问题做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丰富了国内中亚研究的内容，有助于国内中亚研究水平的提高。我特别期待国内从事中亚研究的年轻学者有更多更好的著作问世。

杨 恽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前 言

苏联解体之后,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获得独立。五国的独立,是苏联剧变带来的副产品之一,而非各国人们努力奋斗获得的成果,因此这一现象不是当时人们所期望的。正如学者评价的:“历史,并不符合既有的时间表,也不会让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变化严阵以待,正如独立突然之间降临在中亚各国领导人身上一样。”^①获得了独立国家的身份,中亚国家随即开始了国家建构与社会转型。中亚五国的这一进程已经过了二十余年。中亚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但也面临着一定的问题。各国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保障了独立、维护了主权,实现了对国内政治生活的治理,并有效地参与国际事务和对外交往。同时,各国也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既有安全、政治方面的,也有经济、社会方面的。这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国家建构过程中成就与问题并存并非中亚国家所独有,但大国势力在该地区的交织在一定程度上使中亚国家的国家建构和社会转型进程趋于复杂。

中亚地区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历来被大国视为扩大自己势力范围与维护自身优势地位的重要区域。中亚国家独立以后,该地区在欧亚大陆的枢纽地位、各国独立带来的商品市场以及该地区丰富的矿产与能源,吸引了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的关注与介入。大国参与中亚地区事务有其必然性,这是发展与中亚国家友好关系和维护自身在中亚地区利益的重要途径。然而,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对于中亚地区在世界政治中的地缘重要性,各大国的认知有所不同,而且这一认知是随着世界格局、大国关系、中亚地区的局势、各大国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的。整体而言,在21世纪之前,中亚地区并非一个令世界密切关注的区域。这种局面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发生了改变。随着2001

^① Rajan Menon, “Introduction: Central Asia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in Eugene Rumer, Dmitri Trenin and Huasheng Zhao, *Central Asia: Views from Washington, Moscow and Beijing*,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7, p. 5.

年10月美国开始在阿富汗开展以打击塔利班与基地组织为目标的“持久自由行动”，中亚国家卷入了大国势力争夺的洪流中，也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一波大国介入中亚地区以推进本国利益、中亚国家利用大国提供的机遇和资源以推进国家构建与社会转型的持续互动过程中，大国是否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中亚国家又是如何周旋于其中，这些问题一直不乏国内外学者进行研究，由此也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美国在中亚的活动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讨论美国与中亚国家之间互动过程的历史与现状。在目前的中亚地区事务中，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也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行为体。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而言，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存在和活动值得进行深入分析。这是因为：其一，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仍陷于阿富汗战争的泥淖之中，美国的军事行动和其他活动对中亚及其周边地区有重要的影响。其二，美国对中亚地区事务的参与，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局势的演变。其三，21世纪以来的中亚已成为一个大国利益集中的地区，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在中亚都有自己关切的利益，美国在中亚地区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国际体系的演变趋势，同时对中亚各国的外交取向和国家建构产生了影响。最后，中亚地区属于中国的周边地区，该地区的发展趋势和大国对中亚事务的介入影响到中国在中亚利益的维护与拓展。因此，如何恰当处理美国与中亚在中亚地区的互动以维护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是中国学者必须关注和研究的，对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情况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

一、现有研究成果评析

对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影响及可能的走向，国内外学界做了大量的研究。尽管美国的中亚政策或介入中亚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仅是国际学界对中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分支——中亚与大国关系——的一个部分，但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国际关系学界，均对美国在中亚（偶尔会使用里海地区的名称）的利益、政策或战略、活动，与各国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大国之间的互动、对中亚五国的外交政策与影响等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并就这些问题进行过诸多研究。就公开发表的成果而言，美国与中亚地区关系的研究成果多以学术论文、论文集、研究报告、专著、新闻报道、学位论文等形式出现。既有成果之多，很难予以精确统计；从事这些问题研究的学者，也很难一一罗列。国内外学术界对美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研究，一方面与对美国中亚政策有浓厚兴趣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为中亚研究提供了许多资

料。只要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重视维护在该地区的利益,以及世界各国决策者和民众有了解美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需要,那么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成果仍将继续出现。

然而,尽管研究美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成果和学者众多,但是这一问题还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此外,由于美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关系动态性强,长期跟踪和深入研究该问题的学者不多,相关成果也不是很丰富。以国内外成果中的专著为例,无论是国内学术界还是国外学术界,专门就美国和中亚国家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入研究的专著都不多见。^①在国内,真正以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的专著,有杨鸿玺所著的《美国中亚战略20年:螺旋式演进》、^②徐洪峰和李林河所著的《美国的中亚能源外交(2001—2008)》、^③王鸣野所著的《美国的欧亚战略与中南亚五国》等。^④除此之外,其他专著一般都将美国的中亚政策和活动纳入其他大国与中亚或里海地区关系的框架之中进行讨论。比较典型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孙壮志研究员1999年著的《中亚五国对外关系》,^⑤郑羽研究员主编的《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⑥复旦大学赵华胜教授所著的《中国的中亚外交》,^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赵会荣所著的《大国博弈: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战略设计》等。^⑧这些专著虽然辟有专门的章节对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进行讨论,但美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集中研究的主题。以上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对美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研究的整体状况。

在国外学术界,状况大致相似。以美国为例,除了智库报告(如兰德公司、美国国会研究局出版的一些报告),公开出版的关于美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的专著较罕见。^⑨就笔者掌握的资料,仅有的几本专著包括:马修·克劳斯通(Matthew Crosston)2006年所著的《滋养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民主与美国对中亚的

^①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估,也可参考郑羽主编:《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苏晓宇:《美国对中亚军事战略研究》,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08年,第2—9页。

^②杨鸿玺:《美国中亚战略20年:螺旋式演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③徐洪峰、李林河:《美国的中亚能源外交(2001—2008)》,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④王鸣野:《美国的欧亚战略与中南亚五国》,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⑤孙壮志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

^⑥郑羽主编:《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⑦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

^⑧赵会荣:《大国博弈: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战略设计》,香港:光大出版社,2007年版。

^⑨这里主要评估了专著的情况,而不是众多相关研究报告,毕竟学术专著才是某个学术问题得到学术共同体关注和学术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参与》、^①沙拉姆·阿克巴扎德(Shahram Akbarzadeh)2005年所著的《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威权主义、伊斯兰主义与华盛顿的安全议程》。^②至于阿赫麦德·拉什德(Ahmed Rashid)的《陷入混乱：美国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国家建构的失败》一书，书名似乎是专门论述美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关系的，然而该书将重点放在了美国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影响上，对中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着墨不多。^③另外，戈达特·巴嘎特(Gawdat Bahgat)于2003年出版的《美国在波斯湾和里海的石油外交》一书也存在相似的问题。作者集中讨论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开展的外交活动，而对里海地区的论述仅有最后一章。即使在这一章，高加索国家而非中亚国家才是作者论述的重点。倒是那些并非以美国和中亚或里海为题的专著，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讨，如尤根·B. 鲁默(Eugene B. Rumer)、德米特里·特林宁(Dmitri Trenin)与赵华胜编的《中亚：来自华盛顿、莫斯科与北京的观点》、^④罗伯特·莱格伍德(Robert Legvold)主编的《战略性地思维：大国、哈萨克斯坦与中亚复合体》、^⑤雷恩·缪勒逊(Rein Müllerson)所著的《中亚：大博弈棋局与下棋者》^⑥等。通过这些简要介绍可见，对美国与中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均未进行全面的研究。因此，在为读者提供一幅关于美国中亚政策的全景图方面，国内外学术界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

国内外关于美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的专著成果较少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成果的理论化程度还有待提升。美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属于中亚问题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作为区域研究的中亚问题研究，又是国际关系学学科的一部分。然而，现实情况是，中亚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脱节的。尽管国际关系学者在探讨中亚问题时一般会参考中亚问题研究学者的成果，然而中亚问题研究学者却很少参考国际关系学科的成果，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成果。尽管这种现象近来有所改变，如杨鸿玺的《美国中亚战略20年：螺旋式演进》，尝试通过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美国中亚战略的演变。然而，实践与理论脱节的现象，在国内外研究美国与

^① Matthew Crosston, *Fostering Fundamentalism: Terrorism, Democracy and American Engagement in Central Asia*,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② Shahram Akbarzadeh, *Uzbekist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uthoritarianism, Islamism and Washington's Security Agenda*,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2005.

^③ Ahmed Rashi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ilure of Nation Building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NY: Viking Press, 2008.

^④ Eugene B. Rumer, Dmitri Trenin, Huasheng Zhao, *Central Asia: Views from Washington, Moscow and Beijing*, London: M. E. Sharpe, 2007.

^⑤ Robert Legvold, *Thinking Strategically: The Major Powers, Kazakhstan, and the Central Asian Nexu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⑥ Rein Müllerson, *Central Asia: A Chessboard and Player in the Great G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中亚国家间关系的成果中仍较为突出。正如学者评价的：“对于美国在中亚地区角色的理论研究成果是比较罕见的。大多数的成果是传统意义上的政策取向的研究，它们试图界定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有限性和利益，希望通过评估美国政策来启发决策者。”^①

而就中亚问题研究这个整体而言，理论研究缺失的情况同样比较明显。有学者指出：“中亚研究的全景图中，唯独缺乏中亚研究的理论史，这也构成了西方中亚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②关于美国与中亚地区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存在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大量成果中的多数都是政策取向的，缺乏对美国中亚政策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论研究。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成果数量之多并不全然等于学术水平之高。而要提高此类成果的学理水平，重视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结合无疑是有效途径。当然，要求加强对中亚问题的理论研究，并不意味着关于美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没有价值。相反，既有的成果对人们了解大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关系已经并且将继续做出贡献。然而，为了实现中亚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衔接以及提高中亚研究的理论水平，尤其是让中国的中亚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界产生更多的影响，中亚研究学者有必要加强理论素养并提高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能力。

理论是一种研究工具，具有描述、解释与预测等方面的功能。^③截至目前，理论最受重视的功能是解释，而描述这一功能并非理论所独有，预测功能因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而面临诸多的限制。^④就此而言，中亚问题研究者应该加强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亚问题（包括该地区大国关系）的能力。比如美国中亚政策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阶段的演变；美国中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目标，如果没有实现这些目标，原因何在；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中亚政策有何区别，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如果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的回答，那么将极大地提高中亚研究的学理化水平，并为该领域的研究积累更多更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然而，在强调加强对中亚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时，必须明确理论并非万能，也不能仅仅将各种理论简单地叠加在一起。由于理论是通过对复杂现实生活的抽象和简化而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它们很可能会忽视某些同等重要的方面，造成理论不能对社会生活或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给予准确的解释，由

^① Matteo Fumagalli,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Asia”, in Emilian Kavalski, ed., *The Regional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Actors*, New Jersey and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0, p. 9.

^② Leonard A Stone, “Central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Vol. 29, No. 1, 2012, p. 184.

^③ 详见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2008年版，第一章。

^④ 要求重视理论预测功能的观点见陈定定、刘丰：《认真对待预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预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期。

此导致“几乎不存在一种大理论能够对国际法、政治学、民主或人权的所有方面进行面面俱到的解释，而且也不存在一种对中亚局势进行全面分析的单一研究途径”。^{①②}在这种背景下，综合运用各种理论来分析某一种国际关系现象或中亚问题也就成为必须。不过，在此过程中应该避免一种倾向，即将本体论和认识论截然不同的理论简单综合起来解释同一种国际现象。^③

本书将集中运用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对美国中亚政策进行分析。这里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因为本书对美国的中亚政策的分析，既涉及大国在国际体系和中亚地区之间的权力分配这一结构性因素，同时还涉及美国政府、美国国会、活动于中亚地区的美国石油公司和军队、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美国学者等国内行为体。换言之，本文关于美国中亚外交政策的研究，涉及国际体系和国家这两个主要的研究层次。而将国内因素纳入外交政策的研究中，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

二、本书的基本目标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的中亚政策及其活动。为了遵照国内关于中亚的习惯用法，同时也为讨论的方便，本文将中亚视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五国。尽管国内外学界关于“中亚”一词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但鉴于这一问题非常复杂，本文不对此进行专门讨论。^④事实上，将中亚视为由五个斯坦国组成的一个独特地区是有道理和意义的。如雷恩·缪勒逊(Rein Müllerson)认为，之所以有必要将五国视为一个独特的地区，主要是因为五国共享“地理、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缘战略上的相似性”。除了这些共同的特征，中亚五国具有的地区性还体现在外部行为体对五国相似性的意识和认同上，“新中亚的概念意味着国际行为体需要形成一种对其进行分析的更广泛的分析和政策框架。换句话说，中亚的

^① Rein Müllerson, *Central Asia: A Chessboard and Player in the Great G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6.

^② Ibid, p. 15.

^③ 比较典型地就是运用国际关系的“三大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解释同一种国际关系现象。对这种研究方式的深入批评见周方银、王子昌：《“三大主义”式论文可以休矣——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与综合》，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1期。杨鸿玺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一问题，因为它综合运用了地缘政治学说、世界体系学说、建构主义、“软实力论”、“文明冲突论”、博弈论等理论或研究途径来解释美国中亚政策的演变及面临的困境，尽管作者指出了“正确看待国际关系理论、避免陷入误区”的必要性。见杨鸿玺：《美国中亚战略 20 年：螺旋式演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3—51 页。

^④ 对“中亚”一词涵盖范围的辨析，可参考郑羽主编：《中俄美在中亚》，第 1—4 页。

‘地区性’源自于国际行为体对该地区各国共享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脆弱性日益增强的意识，这些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驱动着（如果不是困扰）地区各国的工作”。^①就美国政界和学界而言，尽管存在着将“中亚”拓展到包括阿富汗和南亚国家的声音，但中亚主要指中亚五国的观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接受，而且在美国政府和中亚各国政治家的官方表述中，一般都将五国组成的地区称为中亚。^②因此，当客观基础和外部行为体就中亚五国的“地区性”能达成有效的共识时，那么将中亚地区视为由五个中亚国家组成的一个有别于南亚、中东等地区的概念，也就具有了可行性与合法性。

当然，在支持中亚仅包括五国并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的同时，也必须牢记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异。正如格里高利·吉里森(Gregory Gleason)早在1996年就已经指出的：“尽管经常提到穆斯林传统的共同性，或是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但是很少有什么一般的特征比较公正地运用到（中亚）国家政府身上。尽管中亚各国看似是一个社会，因为它们与苏联处于同一行政机构之中，但随着各国独立，它们很快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发展。”^③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国家建设和转型努力之后，中亚五国彼此之间的差距已愈加明显，不过即便这样，相对于其他地区（如高加索、南亚、中东），五国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并未彻底消失，而是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因此，本书在讨论美国的中亚政策时，主要关注的是美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至于阿富汗、高加索地区、南亚地区等国，只有在密切涉及以上关系时才会偶尔提及。

本书的主要目标，在于分析和讨论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美国中亚政策的演变过程、战略目标、具体行动、政策效果等问题。具体而言，本书希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美国如何认识中亚地区及其重要性，这种认识经过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过程？(2)美国如何评估中亚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及其在中亚地区的利益以及如何认识这些利益面临的威胁；(3)根据这些认知，美国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措施？(4)美国政府和学界如何对这些回应措施进行辩护？(5)美国学界中亚问题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主要关注什么样的议程，并采取了什么样的研究途径？(6)美国中亚政策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中亚国家（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俄罗斯）如何对美国中亚政策做出回应？

以上这六个方面的问题，既涉及美国中亚政策的历史，也涉及美国中亚政

^①Emilian Kavalski, “Uncovering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Dynamics of External Agency in a Turbulent Region”, in Emilian Kavalski, ed. ,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Regional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Actors*, New Jersey and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 2010, p. 7.

^②参考 Evgeny F. Troitskiy, “U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and Regional Security”, *Global Society*, Vol. 21, No. 3, 2007, p. 415.

^③Gregory Gleason, “Indigenous Democracy in Central Asia”, 见 gopher://gopher. soros. org: 70 / 00 / Affiliated_Orgs / OSI_NY / Tajikistan_Project / democracy1. txt

策的现实；既涉及美国中亚政策的具体实践，也涉及美国中亚政策的理念基础；既涉及美国中亚政策的物质基础，也涉及美国中亚政策的话语建构以及学术研究；既有美国针对中亚政策的具体举措，也有中亚国家对美国政策所做的回应。然而，必须承认，一本书不可能对美国中亚政策的全部内容进行详尽的研究，这既超出本身的范围，也超过笔者的能力。正如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N. 罗西诺(James N. Rosenau)指出的：“我们并不能讨论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全部……观察家必须选取故事的某些重要方面，并将其他方面视为无足轻重。”^①当然，至于认为哪些方面是重要的，往往取决于作者的观点、立场和知识储备。就本书而言，重点关注的是美国中亚政策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美国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状况等以往较少得到关注的问题。

本书希望通过三个方面的结合，实现对美国中亚政策的集中研究。

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美国的中亚政策是具有理论基础的。正如上文提及的罗西诺指出的：“不管决策者是否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总是依赖于某些理论概念。”^②*即使决策者没有学习或掌握逻辑严谨和体系完备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在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时，始终依赖一些理论概念或观点来指导自己的形势分析和具体决策，如国家利益概念、民主和平论等。既有的关于美国中亚政策的研究成果，往往疏于对美国在构想其中亚政策时的思想渊源进行分析。并非这些研究成果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而是它们假定美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决策者与研究者一样，都对美国的中亚政策持一种工具理性——即决策者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的假定。然而，美国在构想其中亚政策时，可能并不单纯遵循工具理性的逻辑。价值观、惯性等或许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如美国在中亚地区对俄罗斯的遏制，就受冷战时期的强烈影响。因此，重新思考美国中亚政策的思想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本书尝试对二十余年来指导美国中亚政策决策者的理论基础进行提炼。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第二个方面，是指美国的外交政策实践与中亚问题研究实践之间的结合。美国决策者不仅指导和从事着美国中亚政策的具体外交活动，而且还引导或借鉴美国研究者关于中亚问题的诸多研究成果。与此相关，美国学术界不仅产生了许多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成果，某些成果还对美国决策者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里德里希·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关于“大中亚计划”的

^①James N. Rosenau, "China in a Bifurcated World: Compe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Robinson,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534.

^②Ibid.

观点。^①因此,在对美国的中亚政策具体实践进行研究的同时,学者们也有必要对美国中亚问题的整体研究状况进行考察。虽然美国学术界对自身的中亚研究进行过一些反思,但这种研究在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出现。

2. 美国全球战略与中亚政策之间的结合。美国的中亚政策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前者很大程度上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塑造。就此而言,对美国中亚政策的讨论,无法脱离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分析。鉴于中亚地区构成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欧盟等行为体的利益重叠区,要实现美国中亚政策与美国全球战略研究的结合,必须首先将美国中亚政策纳入美国与其他全球行为体的关系中进行思考。考虑到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特殊关系,在考察美国中亚政策时,尤其必须注意将其与对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考察紧密结合起来。

3. 美国与中亚国家之间互动的结合。既有的关于美国中亚政策的研究成果,往往只关注美国针对中亚国家采取的各种具体行动,如援助、军事存在、介入中亚国家内部事务等,但对于中亚国家如何回应美国的举措,要么不予讨论,要么语焉不详。根据这种思维方式,中亚国家很容易被视为任由美国中亚政策摆布的行为体,缺乏自己的能动性和相应的行动能力。事实上,与美国一样,中亚国家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种国际行为体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展示了一定的行动能力和创造性,不仅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还能有效地掌控国家的发展方向。尽管在一些特定的时刻,中亚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因未能恰当地处理复杂的大国关系而遭受损失(比如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巴基耶夫在应对俄罗斯压力的问题上),但总体而言,中亚国家的领导人体现出了较高的外交技巧,并通过参与大国交往,为各自国家争取了许多利益。

研究中亚五国与美国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其成效,不仅有助于避免在研究中亚国家被边缘化的问题,而且可能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小国理论做出重要的贡献。^②截至目前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关于中亚国家与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大国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涌现,然而对中亚五国的外交政策展开深入研究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研究中亚地区的人士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该地区的身份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发展,但对各国的外交政策过程很少予以关注。”^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亚研究学界热衷于追踪热点问题和大国关系,却不愿花费大量的精力去从事小国的外交理

^① 可参考 S. Frederick Starr, “A ‘Greater Central Asia Partnership’ for Afghanistan and Its Neighbors”, *Silk Road Paper*, March 2005; S. 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4, 2005, pp. 164 – 178.

^② 可参考 Rajan Menon and Hendrik Spruyt, “The limits of Neorealism: Understanding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1, 1999, pp. 87 – 105.

^③ Alisher Khamidov, *The Base of Contention: Kyrgyzstan, Russia and The U. S. in Central Asia (2001—2010)*, Ph. D Dissertati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2011, p. 398.

论等基础性的研究工作。^①本书因为集中关注的是美国的中亚政策，将不对中亚各国的外交政策展开专门研究，但对中亚国家如何回应美国的中亚外交将进行专门分析。

三、本书的基本内容

本书在尝试实现上述三个结合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地分析美国中亚政策的演变及中亚国家对美国所做的回应。鉴于美国的中亚政策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能源、军事、非传统安全、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本书无法对所有的这些活动进行面面俱到的研究，而只是集中论述其中的某些方面。本书重点考察的内容包括美国中亚政策的演变，在中亚地区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美国针对中亚各国采取的安全援助政策以及为获得中亚国家的军事基地所做的努力，美国通过多边国际机制对中亚各国的整合，美国中亚研究界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其特征与政治效应，中亚国家对美国以上措施所做的回应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政治能动性。本书共分五章和结论，每一章集中研究一个问题，每一章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结合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回顾美国中亚政策的演变。从这

①仅有的不多的研究成果包括：孙壮志对五国外交政策的总体考察，见孙壮志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还有一些分国别研究中亚国家外交政策的成果。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的研究，见赵会荣：《大国博弈：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战略设计》，香港：光大出版社，2007年版；Leila Kazemi，“Domestic Sources of Uzbekistan’s Foreign Policy, 1991 to the Pres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6, No. 2, 2003, pp. 205–216; Matteo Fumagalli，“Ethnicity, State Form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Uzbekistan and ‘Uzbeks abroad’”，*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6, No. 1, 2007, pp. 105–122; Dina Rome Spechler and Martin C. Spechler，“The Foreign Policy of Uzbekistan: Sources, Objectives and Outcomes: 1991–2009”，*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9, No. 2, 2010, pp. 159–170；关于土库曼斯坦外交政策的研究，见Luca Ancechi, *Turkmenistan’s Foreign Policy: Positive Neutralit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Turkmen Regim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Ahad Abdurahmonov, *The Role of Energy Resources i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of Small Stat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yrgyzstan and Turkmenistan*, Master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yoming, 2009. 关于塔吉克斯坦外交政策的研究，见Lena Jonson, *Tajikistan in the New Central Asia: Geopolitics, Great Power Rivalry and Radical Islam*, London: I. B. Tauris, 2006；关于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见Alisher Khamidov, *The Base of Contention: Kyrgyzstan, Russia and The U. S. in Central Asia (2001–2010)*, Ph. D Dissertati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2011; Thomas J. C. Wood, *The Formation of Kyrgyz Foreign Policy 1991–2004*, Ph. D Dissertation, 2005, Tufts University. 关于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见Sally N. Cummings, “Eurasian Bridge or Murky Water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deas, Identity and Output in Kazakhstan’s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19, No. 3, 2003, pp. 139–156; Pinar Ipek, “The Role of Oil and Gas in Kazakhstan’s Foreign Policy: Looking East or West?”,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9, No. 7, 2007, pp. 1179–1199; Kuralai I. Baizakova, “Energy Security Issues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32, No. 2, pp. 103–109.